

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

罗康隆¹ 田广²

(1.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湖南 吉首 416000; 2. 汕头大学商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要 经济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过程, 严格地说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才正式开始的, 关于我国西部的开发研究以及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创立, 就是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标志。在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 我国的经济人类学理论工作者对现代化过程进行了理性的反思, 提出了民族经济利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 提炼和发展了“相际经营”的理论模式, 在本土化的同时又为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关键词 经济人类学; 西部大开发; 民族经济学; 相际经营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3-0057-40

一、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规律的人类学分支学科,^[1]是人类学与经济学的对话,它以人类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不仅描述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还进一步研究这些系统如何组织、运作,并创新理论来描述社会制度的脉络以及影响经济运作的动力等。换言之,经济人类学是一门从人类学视野出发,运用民族志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制度和行为的科学,^[2]是20世纪经济学与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是一门跨领域的综合性学科。^[3]

经济人类学家通过实地考察,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其特有的学科理论来解释经济观

念。在广义上,人类学家旨在从个别到大众的每个层级中发现社会组织的本质。从19世纪开始,经济人类学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以“原始人类经济”的形态存在为话题,试图检验这样一个原理:世界的经济秩序必须以巩固西方工业社会为准则。当然,随着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其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今天,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延伸扩展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完善,因此人们对经济人类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具有浓厚的兴趣。^[4]

(一) 经济人类学及其发展概略

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期间大部分人类学家都在研究“原始人”的经济行为是否也出于对效率的追求,以及是否适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即“理性行为”。起初,人类学家

(收稿日期) 2014-01-18

(作者简介) 1. 罗康隆(1965-),男(侗族),贵州天柱人,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2. 田广(1957-)男(回族),宁夏银川人,汕头大学商学院教授,吉首大学应用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博士。

(基金项目) 汕头大学文科科研项目《经济人类学发展新趋势研究》(编号SR11005)阶段性成果;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我国西部地区各民族生计方式多样性及其生态安全保障体系研究”(NCET-10-0146)阶段性成果

收集了大量有关进化理论的史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地调查变得更加流行，人类学家试图用在研究“原始”社会时的发现来探讨更普遍的主流经济体，最终因误解了经济学家的认知前提而未能成功。^[5]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第二个阶段，期间美苏冷战达到高潮，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宣布扩大公共服务，同时维持对于金融市场的有力控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导致经济人类学家之间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经济学家们关于世界经济研究的范围已经扩大，囊括了部落数量在不断减少时期的各国农民经济。形式主义者认为主流经济体的概念和工具更适用于研究范畴被扩大了的世界经济，但实体主义者则更倾向于体制化的方法。所谓“体制化”是指社会经济命运并非由客观市场所主导，而是经济融入从家庭到政府以及宗教等其他社会体制内。

经济人类学的第三个阶段处于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点，具体来说又分为全球化扩大的三个“十年”，分别是经济人类学的“批判理论”、“文化交替”以及“硬科学”三个理论形成时期，其中，“硬科学”理论在“新制度经济”的包装下尤为突出。这个时期见证了人类学家的种种努力，他们通过学习研究大量的理论概念，扩大调查研究范围，试图完整地定义人类经济组织的范畴。在此过程中，他们更倾向于坚持民族志基于参与式观察的传统理论和方法。

现阶段是人类学家能够更进一步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成熟时期，是经济人类学发展的第四个也是全新的一个阶段。这将有助于经济学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世界经济的最基本问题在于：市场经济的形式允许北大西洋社会体占据世界经济体的主要地位，但这一形式是否遵循了普遍有效性原则？这场关于相同性和差异性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但人类学家并未因此而中断对不同地区居民思想和行为的研究。经济人类学家通过将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华尔街看成是一个猎人聚集的小社区，用西方经济模型分析华尔街对金融的冲击，是完全可行的。然而，用理性的市场模型来分析非市场经济下的行为，则缺乏有效的说服力。^[6]

（二）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早期应用与传播

在经济人类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对西方主流学者而言，中国一直处于较次要和边缘的地位。^{[7] (p. 262-263)} 尽管如此，在浩瀚的经济人类学文献宝库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早期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报告成果。美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丹尼尔·哈里斯·葛学溥(D. H. Klup)于1925年发表的专著《华南的乡村生活》，虽非经济人类学专著，但作者以民族志的方式，全方位地描述了华南一个乡村村落，详细记录分析了该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村民的经济生活，不乏细致的对经济观察和访谈记录，以及比较深刻的分析，应当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涉及中国乡村经济研究的人类学著作。^[8]

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先驱费孝通教授于1938年发表的《江村经济》，是一项非常出色的经济人类学研究报告，它以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过程为实证材料，探讨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宏观社会变迁过程及可能的应付之道。费孝通在详实的经济人类学民族志分析研究基础上，指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非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这部著作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9]

后来，费孝通与其助手合作完成了一项针对中国农村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并于1949年以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为题在伦敦出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费孝通以其丰富深蕴的人类学学识，详尽地描述与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前云南三个村庄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了工业化是改变中国乡村经济长期落后状况的唯一出路战略思路，是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又一力作。^{[7] (p. 270)} 美国经济人类学家威廉·施坚雅是最早对中国进行研究的西方经济人类学家之一。他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表在《亚洲研究季刊》的民族志研究报告，阐述和分析了中国乡村传统市场的功能与地位，探讨了中国乡村市场的发展演变过程，对新中国的农村市场制度的变革及其政府相应的政策问题，

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开启了国外学者对中国进行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先河。^{[7] (p. 262 - 269)}

在此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未针对中国进行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除了港台地区一些人类学和民族学者外，我国学术界对于经济人类学这个学科的了解尚不多。当时港台学者所关注的并非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而是一些比较基本的经济人类学理论问题。比如徐光正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人类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集中讨论了经济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和领域问题，包括传统经济研究、经济成长与社区发展，以及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等内容。^{[7] (p. 271 - 272)}

(三) 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近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陆续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比如美国人类学家A. 小艾伦有关“经济人类学”的论述就被翻译后在《世界民族》发表。这是20世纪80年代较早介绍经济人类学的中文文献之一。^[10]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在促进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方面，无疑起到了领导作用，1995年该所主办了“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会，来自台湾地区的蒋斌博士发表了以“经济人类学”为题的讲稿，向大陆的同行们介绍了经济人类学实在与形式两大学派的主要观点及其争论。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王燕祥分别在《民族经济》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简要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并探讨了产生于我国的民族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的异同。1997年，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在其《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介绍了美国施坚雅对中国乡村所进行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同年，日本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被翻译为中文在我国正式出版。该书是我国学术界可见的首部全面介绍经济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领域和学术流派的著作。^{[7] (p. 273 - 276)}

步入21世纪以来，经济人类学视野的开阔和理论的创新，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显著标志有二：第一，经济人类学从以前的零星介绍步入了有专门队伍的研究；第二，两本以“经济人类学”命名的著作在2001年和2002年相继

出版，一本是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所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经济人类学》；另外一本是由中央民族大学施琳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两支稳固的团队，分别在中央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建立起来。^[11]当然这种看法的准确性还有待商榷，但这两所大学陆续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学生，并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经济人类学方面的文章。^[11]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以民族志的形式出现，虽未以“经济人类学”的名称出现，但仍可归入经济人类学研究领域。阎云翔通过对中国北方一个村庄的民族志观察，对波兰尼“社会整合模式”的三种交换体系中的“互惠”进行再研究，指出在中国礼物的流动同时也包含了人情、面子等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嵌合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与传统的互惠原则相违背。^[12]罗红光从民族志角度对一个村庄的生计方式、市场贸易、宗教仪式内含的财富意义进行阐释，^[13]论证了经济不仅仅是独立的体系，而是嵌合在整个生活体系当中，与宗教、意识、宇宙观等相联系。

与此同时，云南大学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名目下招收经济人类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而中央民族大学则是在“人类学”名目下招收经济人类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此外，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逐渐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比如，上海大学设有经济人类学方向的硕士、博士学位项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也将经济人类学纳入其学生培养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7年开始招收经济人类学方向的博士。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陆陆续续开设了经济人类学方面的课程。^[11]同时，越来越多的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也将关注视野转移到了经济人类学，试图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问题。除此之外，许多人类学研究人员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1]与此同时，经济人类学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都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章。比如2004年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孙秋云主编的《文化人类学教程》、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2006年田兆元主编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7

年周大鸣修订的《人类学导论》等,都对经济人类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一定的陈述。^[11]

二、本土化实践与西部大开发及民族经济学

(一)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开发研究中心

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批当时还都很年轻的学者,以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思想,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至今看起来依然很富前瞻性的中国西部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对发展经济学曾经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并成为当代经济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这些西部学者的研究,纳入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范畴。

从1980年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到世界上有一个南北对话、国内有一个“东西对话”的问题,提出将我国经济的战略重点逐步向大西部转移。而在全国各地有一批志愿研究西部的青年学者,从自由联络到松散结合,首先成立了中国西部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组(简称“西部组”),进而组建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西部中心)。这里的西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11省区:陕、甘、宁、青、滇、黔、川、桂、内蒙古、新疆、西藏。西部人口占全国比重约30%,面积约70%。1984年5月,内蒙古党委政研室郭凡生在《新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提出新技术革命给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超越发展的机会,国内不发达地区也可以依靠其丰富的资源优势,从国际上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实现超越发展,而不仅仅是接受第一二梯度转移来的技术。同年6月,《世界经济导报》以《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实行超越发展》为题刊登了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14]

与此同时,中央部委研究机构的一些学者也把目光落在了西部民族地区。他们所撰写的《贵州农村考察报告》、《把西藏经济的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等理论书籍和研究报告,引起各方关注。1985年8月中央有关部委与西部各省区政府联合召开“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准确无误地选取区域和

行业突破口的观点。^[15]之后,关注西部的青年学者组成了西部组并做了许多深入的调查研究。1987年12月,东西部9个省区、80多位代表参加在贵阳举办的“发展问题——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1988年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与新疆党委政研室于1988年初开始在新疆进行西部与民族地区改革与开放综合研究试验区的方案设计。这次调研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必须向西部开放的共识,新疆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14]

西部中心和新疆组成联合代表团去西亚六国考察,撰写了研究报告《中国西部必须向西开放》。1988年夏秋,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调研报告,集成《中国西部: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抉择》一书出版。1989年3月西部中心又组织了一次“发展问题——中国东西部理论工作者对话会”,提出:把西部开放作为全国性战略;实行“贸易为主、产业联动、分步实施、促进开发”;在南疆和云南德宏建立试验性自由贸易区,试验成功,逐步推广等一系列设想。1989年4月,西部中心主要领导亲自带队考察云南,就德宏设立特殊开放区域的可行性以及必须进行的相关体制改革问题做了调研论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实施这一战略构想的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设计方案。这一方案设想中国西部有两个走向印度洋的出口,一个从新疆经巴基斯坦,一个从云南经缅甸。^[14]

西部中心的学者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的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田广、邓超、林玲的《彻底变革产权主体,推动完善市场机制》(《投资研究》1988年第11期);郭凡生与田广的《道路与模式的反思:中国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研究》(《开发研究》1989年第3期);冯宛平、田广的《二元经济的弱化与趋同:云南省安宁县经济发展二次机遇的科学抉择》(《开发研究》1989年第1期);郭凡生、田广的《区域推进: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与模式新探》(《思想战线》1989年第6期);郭凡生、田广、潘照东的《面向发展的投入选择:中国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中货币信用政策研究》(《投资研究》1988年第11期);田广的《走出二元分离的困境:从云南安宁县的工业与城市化谈起》(《思想战线》1988年第4期);郭凡生、田广的《西部民族地

区的改革开放问题的再认识和思考》(《开发研究》1987年第6期)等等。^[4] p. 349)

(二) 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及贡献

我国本土成长的一些经济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建民族经济学学科,编写出可作为该学科正式从经济学、民族学母体脱离出来的标志性著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1979年3月在北京全国经济科学八年规划会议上,民族经济学被正式确定为当时经济学的第27个分支学科。民族经济学的创建,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各民族及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情需要,主要是为了研究解决少数民族与加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而创立的全新学科。它从一开始便把研究和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学术旨趣,用自己特有的理论、方法和视角,选取了一些全局性的、紧迫性的问题开展研究,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6]

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7]1979年至1985年为创始阶段,在这一时期中,理论工作者广泛深入进行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为理论综合积累资料。施正一的《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李甫春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为这个时期代表性的理论著作。1986年至1990年为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理论工作者结合国家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需要,进行研究探索。一大批带有理论性、规范性和前瞻性的著作问世。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施正一主编)、《选择与发展:中国不发达地区经济振兴断想》(田广、韩国良等)、《起飞前的战略构想》(曹征海、马飙)、《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田广)、《寻求均等的发展机会》(龙远蔚)、《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况浩林)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张协堂)等。^[17]1991年至1995年为成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理论著作数量大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当代中国大辞库——少数民族经济卷》(陈虹、哈经雄主编)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九十年代发展战略探讨》(赵延年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高言弘主编)、《民族经济学》(童浩主编)、《民族经济学导论》(施正一著)

和《民族经济学》(陈庆德著)等。学者们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开始采用规范研究方法进行理论研究。^[17]1996年至2000年为后成熟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在理论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显著特点是理论研究从总体、综合层面逐步向一些特殊的分支领域,如缩小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反贫困、沿边开放以及海外华族经济等方面过渡。除已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经济学教程》(施正一主编)等著作以外,这一时期民族经济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部分学位论文也在理论和政策导向方面有所创新。

在王燕祥四阶段划分的基础上,我们将2001年以来的民族经济学发展统称为新千年阶段。在这个时期,民族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一个经济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许多硕博士论文皆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民族经济社会进行研究,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如马冬梅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对回族“乜贴”的研究就用了经济人类学视角。2005年,理查德·韦尔克的《经济、生态人类学与消费文化研究》、斯图瓦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以及2006年朱迪斯·E·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中译均被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发表,这些文章给中国经济人类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11]

同时,国家经济决策部门也更加依赖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民族经济学》课程也被国家教育部规定为本科民族学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理论课程。在学科建设上,民族经济学学科极为重视专业性教育,大力培养各级各类民族经济人才,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等30余所高校中形成了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作为中国民族经济学奠基者之一的施正一教授,在其50余年的执教和研究生涯中,先后出版了多种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发表了数百篇重要学术论文,为民族地区培养了340多名硕士、近90名博士。

(三) 民族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的趋同性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广义上说,可根据

需要研究世界上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既可将一个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也可将一些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从狭义上说，其研究对象专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它既可将一个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也可将一个民族地区（包括若干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还可把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综合研究的对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经济学对于东西部差距、不同民族间经济差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加速发展战略、西部经济开发、西部人力资源开发、边境开放与边境贸易、西部生态、民族地区城镇化与乡镇经济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公认的理论建树，在实践中形成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科理论体系。^[16]

其实，在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的探讨，从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和表述，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民族经济学是一门强调民族问题与经济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的研究重点放在民族学科与经济学科的交叉点上，其学科性质具有边缘性、交叉性和中介性的特点。这种观点主要侧重于民族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研究。

第二种观点，民族经济这个概念或范畴本质特征具有二重性，将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二者融合为一体。民族经济学是介乎民族学 and 经济学之间的一门中介学科，或者说是研究民族与经济两者相结合区间的一门边缘学科，还可以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不同形态条件下的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两者交叉互动过程特点与规律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或者说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学科。这种观点竭力从不同角度解释民族经济学。^[18]

第三种观点，民族经济学就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这种观点狭义地理解民族经济学的性质。此外还有些学者认为，民族经济学的提法本身就不准确，与区域经济学有很多重合的领域。但我们应该看到，民族经济学主要研究重点是民族学科与经济学科的交叉部分，而区域经济学则侧重于从地域与经济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19]

王燕祥博士认为，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

彼此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其共同之处，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要发挥的作用相距甚远，研究方法也迥然不同。因此，它们在完成各自承担的任务方面不可相互替代。^[17]我们认为这两门学科在我国学术界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重叠部分越来越多，而研究方法也有趋同现象，因此我们认为两者的联合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并由此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以民族经济学为基础，而且只有以民族经济学为基础，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

陈庆德教授早在1993年就发表文章，将经济人类学理论视为民族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部分，并指出两者的共性。与以前相比较，当代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一个重要特点是摆脱了简单地对外人类学加以介绍的情形，更多地融入了学者自己的理解和观点，西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民族的经济史描述走向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过程。从民族经济史到新广义主义流派的变迁，实质是经济人类学逐渐走出闭塞、走向开放的过程。

当代的经济人类学，已是一个研究原始社区、乡民社会、现代生活的广阔门类，研究的内容包括了生产方式、交换体系、物品消费、经济制度、性别、生态、区域发展、学科理论探索等诸多方面。中国经济人类学从传入之初诸多学者纯粹的理论介绍逐步走向多元，理论引进、文化经济、交换体系、乡民社会等各方面被予以关注。^[11]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问题，例如西部大开发等，成为当今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传统经济学的发展理论未能引导其获得良好的可前景时，从不同视角出发的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将更可能获得现实价值和意义。范小青曾明确地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纳入经济人类学的范畴，她认为在中国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有共通的地方，且容易互相渗透。因为两者都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为关注点，一直有着密切联系。^[11]对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关系的探讨得到了包括两方面研究者的关注。在民族经济学研究者方面，早在1987年翁乾麟曾撰文提及民族经济学应从西方新兴学科如发展经济学、经济人类学中借鉴其理论，促进理论与实际

的共同发展。施琳博士在其《经济人类学》一书中，认为经济人类学的中国化必须从本土中生长出来的民族经济学为依托，强调两者的融合和互鉴。2003年吕俊彪撰文总结中国经济人类学发展现状和面临问题时提出当前中国经济人类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通过两学科的融合，完成两学科的传统思想与现代理论的结合，从而实现学科理论的跨越式发展。^[20]

三、经济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理论贡献

(一) 经济人类学与现代化反思

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化”反思理论，是我国本土学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之一。^[21]该理论的倡导者陈庆德认为，社会变迁是人类自我理解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对人、对生活的审视，受到现代社会框架的制约。当不可避免地与所述“现代化”概念相遇时，我们不能将某些具有根本性缺陷的论说视为既定的前提而全盘接受，并赋予这些流行概念或知识以完全的合理性。相反，我们应该正视人类知识不完全的实质而提出疑问。“现代”是一个意义边界极为模糊的概念，它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经历了最近几百年的一个社会过程，而且是有定向标准意义的概念。

陈庆德认为，现代社会造就了一种与其他制度部门分离开来的、独立化的“经济”的存在。依凭这种分立，它使经济因素的动力作用居于支配地位，或者说，经济支配了社会。它导致了由市场因素所构成的经济功能条件与文化整合的冲突，亦导致了它和象征意义的世界观、行为准则的共性相冲突。现代社会以总体的“实践理性”，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诸多特质，而这些改变并非都是正向的。诸如它对物质世界的大规模控制带来的人与自然在表层意义上的分离、物质享乐主义、道德沦丧等等。因此，当代以发展和资源、生态失衡与环境重建等形式，展现出来的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批判，不能仅仅归于经济等个别领域的问题，其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地球资源即将耗尽的问题上，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对现代社会认知模式的反思与质疑。

陈庆德还指出，现代社会的现实进程中充满了压迫性和不平等性。而这正是激起对现代社会

和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主要动力之一。现代化的中心聚焦于经济发展，在经济学领域的分析中，也就更多地展现出了这种定向的特征。无论是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罗斯托的工业化起飞理论等等，各种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模式，都是以18世纪以来的西方经验为依据，描述工业成长的过程，来理解第三世界，并把实现这些模式看成是非西方社会的目标。这些陷于“纯经济”的描述，把人们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局限于“经济——技术”狭窄孔道，而普遍地忽视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由西方知识——权力框架所塑造的霸权关系意义。而对“现代化”概念的反思，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促成原来物质——技术导向的经济学，向象征——文化导向的经济学转变。

陈庆德教授认为“现代化”的概念正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的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中。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消除“西方中心论”的阴影，至少在作为欧洲文化霸权核心基质的“实践理性”上，“西方中心论”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影响力在日益扩大。西方霸权的支配关系，将现代文明构筑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22]由此而形成的“现代化”概念，隐含着把所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结构，视为停滞的、或本质上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坏”结构；并把现代经济增长定义为：归根到底要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从结构到体制的彻底改变。当“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循着这种“现代化”概念目标而“发展”时，带来的只能是心酸和失望。

陈庆德教授初期着重于学科引进，其后，逐渐转向文化经济学研究，发表了大量相关论著，从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角度对文化进行研究，将学科研究推向新的方向。^[23]陈庆德教授于2001年出版的《经济人类学》一书，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经济人类学著作，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和发展历史，而且非常好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人类学发展的

影响，还论述了经济社会过程中民族与民族关系问题。陈庆德在其《经济人类学》一书中，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和内容做了阐述，包括交换、货币、经济制度、经济类型、民族与资源博弈、民族发展与区域发展的异同等内容。该书不仅仅扼要介绍西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和发展，而且注重阐发作者对经济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理解与解释，是一本理论性极强的著作。

（二）民族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

如果说关于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化”反思理论，是我国本土学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之一的話，那么关于民族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理论，^[24]则是我国本土学者在法学的框架下，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又一个贡献。该理论的倡导者李正荣博士指出，民族经济利益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总和，它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主体、历史和现实看，民族经济利益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内容集中地反映在以国家、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利益结构之中。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格局要求法律不能只考虑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要考虑包括民族经济利益在内的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那种忽视群体经济利益，认为只存在国家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李正荣认为，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民族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存在，作为客体的经济利益与作为主体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其二，民族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经济利益。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反映了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里基于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而产生的各民族经济利益上具有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历史实际。其三，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决定了各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在我国，这种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是以二元结构为表征的，突出地表现为汉族居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的差异。民族经

济利益的客观性要求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实际，运用公正有效的法律机制实现民族经济利益的分配。

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利益就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25]这种共同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貌出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国社会各种利益主体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价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民族在内的各主体在基本社会公正理念的主导下，逐步实现其经济利益。1949年9月29日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26]从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确立。经济自治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以经济利益为客观体的经济自治权是经济自治在法律上的表现。

李正荣指出，民族是由民族成员构成的，但民族成员并非全部聚居于一个固定的地域，他们经常由于历史或现实的种种原因而散居在全国各地，今天，这样的散居更为普遍。另外，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基本上地处边疆，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较差，社会生产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无论是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需要获得同汉族或其他地区同等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利益与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是相对而言的，它们的差距反映了民族经济法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守法各个法律实践环节尚存在诸多不足，如何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于法有据和将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即法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命题。

李正荣博士的研究虽然是从法学的角度展开的，但其研究的更重要的贡献是承认并确定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他的研究表明，民族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政府等经济管理部门不仅要明确予以承认，而且要从立法的层面给以保障。通过法律程序来保护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也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话题，本来应该也是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很遗憾的是，民族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缺失。^[27]因此，李正荣的研究在很大

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失，促进了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进展。

（三）经济人类学与相际经营原理

在讨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实践与成果时，杨庭硕教授的理论贡献得到广泛认可。杨庭硕长期从事经济人类学、民族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有生态人类学、民族发展史和生态史等方面，为国内知名的经济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出版和编写专著多部，对推动我国经济人类学学科和民族学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尤其是对我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更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杨庭硕教授在经济人类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1995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相际经营原理——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之中。

我们认为《相际经营原理——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堪称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杰出代表作，其理论贡献和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是不可低估的。杨教授通过大量的田野实证和文献总结，正面回答了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即影响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有哪些，它们的历史和成因，它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的评估，怎样从非经济因素中找出促进生产发展的契合点，如何规避、克服它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等。

《相际经营原理》最大的理论特色，莫过于独具匠心地深思和凝练了“相际”一词。“相”字出台的背景源于各民族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过程，亦有与周边民族、与国家政治、法律等体系交往的历史积淀，更有对所处生存环境的加工、改造和利用的成分，因而将民族文化规约下的社会与自然特征耦合体凝练为“相”。这既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亦与现代自然科学理念相吻合。因此，“相际”所囊括的思辨哲学和学科整合，远远优于“族际”所能表达的含义。^[28]

相际经营理论正是基于对国内外文化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经济学等前沿理论的娴熟把握、消化和吸收，在丰富学科理论的同时，更是将学科的发展推向了新一轮的高潮，为相关学科

的“本土化”研究添砖加瓦。《相际经营原理》是在占有贵州各民族地区大量田野资料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是以贵州当下的现实境遇为纬，以对历史纵深把握为经，因而所提出的“政策论”和“对策论”都是高屋建瓴的可行、可信“对策”。因此，此书的问世，不仅能够对贵州的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新一轮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方案，更是为与贵州境遇相类似的我国西部各民族地区，乃至世界相似区域，都能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蓝本。

结论

本文简述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早期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模式的研究，但著述不多。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曾组织了大规模的针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调查，为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民族经济学的创立和对西部大开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推进过程。在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人类学理论工作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提出了民族经济利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并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化过程进行了理性反思，提出了“相际经营”的理论模式，在经济人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为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从整体上看，人类学在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而作为其分支学科的经济人类学，在中国基本上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别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不仅特别需要包括经济人类学在内的理论研究和指导，而且也为我们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在学习和接受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使之更好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9]

（参考文献）

（1）王燕祥. 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8, (3).

- (2) 东人达. 论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与作用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6, (6).
- (3) 许婧. 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历程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01): 56-60.
- (4) Hann, Chris & Hart, Keith. *Economic Anthropology* [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1.
- (5) 施琳. 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 [J]. 民族研究, 2002, (2): 97-103.
- (6) 田广, 罗康隆. 经济人类学通论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
- (7) 施琳. 经济人类学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 (8) 丹尼尔·哈里斯·葛学溥 (周大鸣译). 华南的乡村生活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 (9)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10) [美] A. 小艾伦 (田广译). 经济人类学 [J]. 世界民族, 1985, (4): 30-38.
- (11) 范小青. 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 [J]. 怀化学院学报, 2009.
- (12) 阎云翔. 礼物的流动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13) 罗红光. 黑龙江: 阿木村の财富 [M]. 日本: 京都行路社, 2000.
- (14) 柳红. 80年代: 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15) 田广, 王丰, 普永生. 论我国多层次波浪式经济结构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 [J]. 广西民族研究, 1986, (3): 9-13.
- (16) 李竹青, 那日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
- (17) 王燕祥. 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8, (3): 81-86.
- (18) 施正一 (主编). 民族经济学教程 (修订本)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 (19) 李忠斌. 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 (20) 吕俊彪. 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当前面临的问题 [J]. 广西民族研究, 2003, (3): 25-28.
- (21) 陈庆德. 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化"反思 [J]. 战略与管理, 2000 (10): 72-85.
- (22) [美] 斯蒂文·贝斯特, 道格拉斯·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中译本, 1999, 145.
- (23) 陈庆德, 马翀炜. 民族文化资本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24) 李正荣. 民族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 [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3, (3): 123-125.
- (25) 孙国华. 法理学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5, 65.
- (26)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289.
- (27) Visser, O. & Kalb, D. Neoliberalism, Soviet Style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1 (2): 171-94, 2010.
- (28) 杨庭硕. 相际经营原理——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 [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5.
- (29) 田广, 周大鸣, 李德宽 (主编). 工商人类学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

Path of Localizing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 China and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LUO Kang-long¹, TIAN Guang²

(1.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2. Business School,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Strictly speaking, the localization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 China started in the late 1970s, symbolized by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and establishing ethnic economics as a discipline. In this process, theoretical worker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made rational reflections on modernization, established the theory of relatively independent interests of ethnic economy and developed a theoretical mode of inter-phase management. They mad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while localizing it in China.

[Key words] economic anthropology; Western development; ethnic economics; inter-phase management

(责任编辑 路辉 徐姗姗)